

# 校友寄语

## 辅导员生活回忆

大跃进年代，打破了一切常规，大家都在没日没夜地干活、开会、学习、辩论、交流、讨论、批判又批判，营养睡眠得不到保障，体质普遍下降。我接手系会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进行一次健康普查。受资源条件限制，我无法组织大家到医院检查，只能布置各班生活干事，按指定问卷，逐个询问记录统计。

除在外地实习的毕业班外，接受调查的同学1231人，患有各种疾病的1023人。多半是肠胃和呼吸系统的慢性病，或伤风感冒之类。这种调查只是摸个大概，肤浅也不专业，说不上准确。我把调查结果和改善措施写成一份报告，向分管系会工作的团委书记陈圣信、党总支副书记李思问汇报，他们很重视，要我在辅导组会上说说，让大家都重视同学的健康。李思问还在党总支会上报告并向党委汇报。

——鲍厚俊，1957年入学，  
1959年担任政治辅导员，  
担任系会主席，兼系团委组织委员

我被抽调做政治辅导员的时间是三个学期，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。我的理解是“政治辅导员”制度中的“政治”是魂，“辅导员”是体（或形）。“政治辅导员”的工作任务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抓党、团组织建设，通过组织政治、时事学习，来引导学生热爱共产党、热爱社会主义，要树立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思想，要培养好的作风，立志为祖国做贡献，等等。除此，“政治辅导员”也承担一些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的工作。我在担任无线电系58至64年级“政治辅导员”期间，同时担任党支部和系

团委书记，年级共有400余名同学，我的工作量是很大的。正在这个阶段，国家出现三年困难时期，尽管国家对大学生有特殊关照，但定量的口粮不够吃，同学们情绪受到很大影响，所以发生的违反纪律的现象就比较多。我总认为，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，我在“政治辅导员”岗位上，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，也经受了很好的锻炼，工作水平得到一定提高，是我一生中很值得称道的经历。

（当辅导员）工作和学业之间存在一定矛盾。当时规定，政治辅导员上午与大家一起上课学习，下午和晚上是工作时间。工作顾及得多了，精力就不能集中到学业上，时间一长，我很难追上其他同学。比如当时第一外语是俄语，我只能保证俄语达标，但其余同学已经进修第二外语时，我只能望洋兴叹了。我当时思想上一个重要支撑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必须全身心地完成任务完成好，至于个人的未来，应当服从组织安排。

——邱桂攀，1958年入学，  
曾任无线电系58至64年级政治辅导员

我在承担大量社会工作的同时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搞好学习。当时我养成了每周、每天写小条安排好时间的习惯，主持会议尽量事先做好准备，以免过多占用学生干部的时间。在绵阳分校时我们专业曾有一位学生当选为校党委委员，她去北京开会返回分校后我主动要给她补英文，她当时很吃惊，我就和她讲学生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，全面发展。

——贾松良，1959-1961年、  
1963-1964年担任政治辅导员